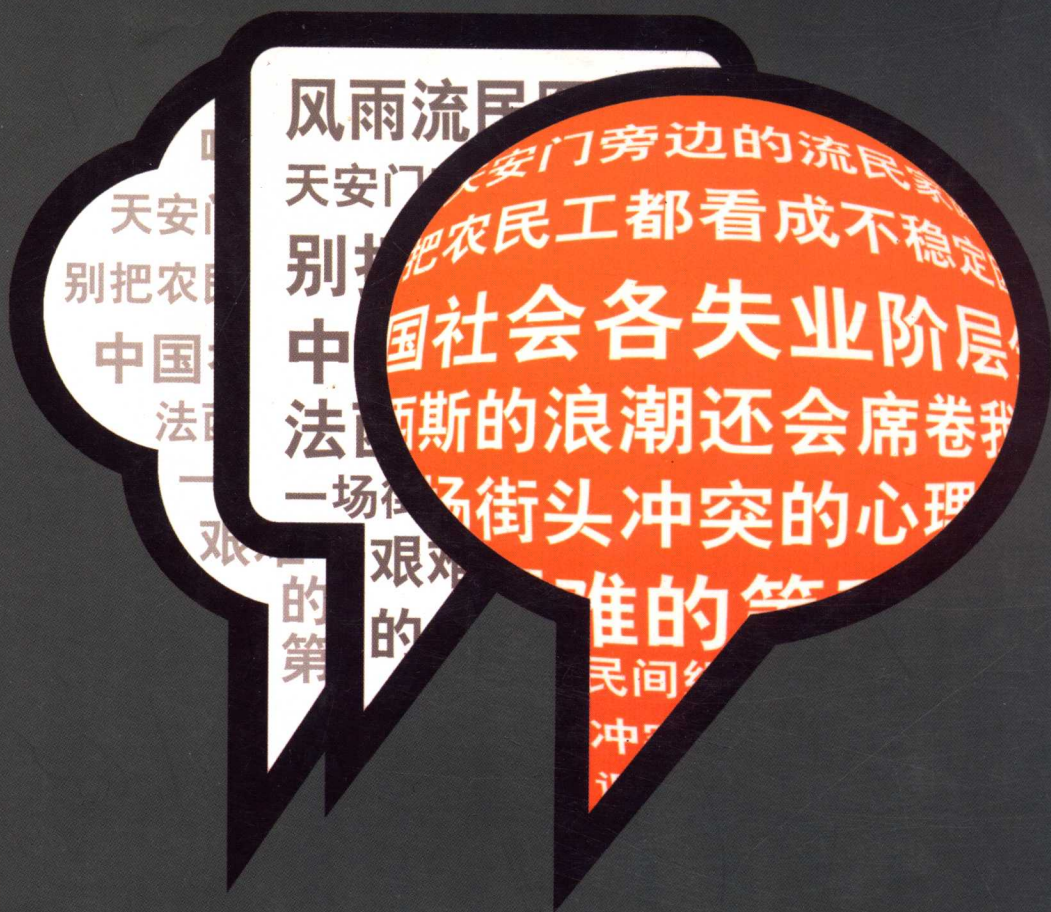


公民|社會|評論



主編 笑蜀 蔣兆勇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



公民社會的呼聲



第三輯
流民、游民與社會動蕩



時報文化出版
2007年11月

C91/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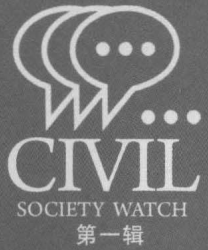
001070832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

主编 笑蜀 蒋兆勇

总顾问 吴敬琏 沈昌文 冯兰瑞 何方 唐逸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笑蜀, 蒋兆勇主编.—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4

(公民社会评论·第1辑)

ISBN 978-7-218-06209-9

I. 流… II. ①笑…②蒋… III. 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54662号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封面设计: 走向视觉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209-9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本书所用图片, 请作者与我们联系, 我们会尽快支付稿费。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0604 34075206】

1000117

北京西城区右街中南海西门国务院总理
办公室

温泉室
亲收

湖南衡阳市韶山国恩行



《来信》 布面油画 张肇增作品

001070835



北京天下之言文化传媒荣誉出品

策划人 李伟东

艺术顾问 陈绍华

书名题字 许燎原

法律顾问 北京维诗律师事务所

学术支持 广东人文学会

封面故事：风雨流民图

- 002 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 谭翊飞
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固然已成为当下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会过于忧心，因为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更有足够的方式来面对可能最坏的结果；我们当然也不会盲目乐观，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当下显得相当严峻，须在短期应对之策和长远治本之道中寻求平衡
- 012 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 张英洪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村民面前：维权需要付出个人巨额成本，不维权则将眼睁睁地看着村民权益的巨大损害。张英南曾问道：国家能否建立好的制度以替代我们的个人维权？
- 018 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 姚遥
跟流民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张世和很满意。慈善做到了极致的时候，人都被感化了，形成一个团体，相互连在一起，谁都不忍心破坏，互相监督，甚至自己制定纪律和规则
- 022 别把农民工都看成不稳定因素——于建嵘访谈录 魏甫华
一种颇流行的观点是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但于建嵘认为，这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学术上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
- 029 切断流民与黑社会的通道刻不容缓——吕文举、杨鹏访谈录 杨子云
如果政府把钱都拿走了，而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效率是很低的，那么失业群体自然就扩大了，高危人群总量就会开始膨胀。格局就变成：一个权力和财富急剧膨胀的政府，面对着日趋庞大、日趋边缘然后日趋危险的一个人群
- 034 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有根——王学泰访谈录 杨子云
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正确对待暴力文化。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不能出文明，出文明需要继承，需要劳动、发明、创造
- 039 从近代湖湘政治透视“流民动乱循环” 十年砍柴
朱元璋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为代价，企图将一个个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以此最大限度防止流民的产生，更防止单个流民汇聚在一起。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是，明朝后期，大明帝国具有历史上可能人数最多的流民人群，成为一个庞大的“流民帝国”，李自成、张献忠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流民中涌现出来的精英
- 044 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 袁剑
2009年将是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化年。至于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

公民觀察

- 050 美國經濟衰退為何未引爆社會動蕩 黃曉岡
英國和法國的罷工行動此起彼落，拉脫維亞、智利、希臘、保加利亞與冰島等國也相繼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全球各地職場的失業群體正快速增加，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一大變量。作為金融危機最大受害國的美國，據統計至今已損失360萬個工作崗位，但整個社會依旧波瀾不驚。個中奧妙，耐人尋味
- 056 希臘騷亂：民主的悲劇還是榮耀 王樂
民主最本質的特徵是給國家這個“利維坦”帶上了枷鎖，并把打開枷鎖唯一的鑰匙交給了人民，讓人民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民主還讓反對派可以合法地質疑執政黨的政策，讓掌握着暴力機器的政府在手無寸鐵的民眾前屈服，讓卡拉曼利斯不得不如履薄冰般處理這場突如其來却又注定要來的騷亂

公民座標

- 060 四年一次，為民主充電——奧巴馬就職典禮實錄 賈西津
民主不是個“做完了”就能享受果子的神木，即便民主授予的合法性也必須不斷更新，以經驗而言，這種更新適于4-5年一次。美國實行了二百年民主，也必須不斷溫習，定期進行政權合法性更新，大選之後的就職典禮儀式，也是美國公民對自身民主的強化充電過程

公民真相

- 070 艱難的第三方——民間組織介入衝突調停 姚遙
妥協是灰色的，一派打倒另一派的时代過去了，凡事皆有規矩法度的时代還未到來，社會衝突面前，真正的公民，當是見壞就上，見好就收
- 076 一個老牌NGO的現代轉型——以“自然之友”為例 兩人
中國民間組織的生存環境一直比較艱難。雖然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民間組織以其卓越的工作走入了公眾視野，但對民間組織管理能力的批評一直沒有間斷。它們如何在推動社會轉型的同时，完成自身的轉型，同樣值得嚴重關注
- 082 瑕瑜並存的湖南公民行動 蘇露鋒
最令人擔憂的是，仍有相當一部分民眾，或因貪圖小利而甘願作“臣民”，或因擔心風險而憚於做“公民”。即使一些敢於對官員和政策說“不”的民眾，也沒有完全走出傳統的陰影

公民心情

- 084 第三只眼睛看大陆（上） 陈诗宁

公民地图

- 096 把记者挨打变成奔向自由的阶梯 笑蜀
098 幸福的广东电视观众 北风
100 历史太长，而生命太短 杨渡
102 一场街头冲突的心理分析 曾颖
106 住近地铁莲花路站 朱鸿召

专题：政府的钱袋子是老百姓的牵挂


- 108 公民税权是宪政的基石 贺卫方
110 众说纷纭话税收 赵国君 辑
112 没有私产，就没有税收——茅于軾访谈录 赵国君
122 揭开“税”的面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134 深度阅读：税收如何减损社会福利

公民阅读

- 136 NGO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意义 林猛
140 法西斯的浪潮还会席卷我们吗——惊心品味电影《浪潮》 郝建

公民文摘

- 144 从泰国到希腊受伤害的民主
145 法国社会运动向左转与“新反资本主义党”
146 马利的民众运动
147 南非：传统工运与新社运团体的对话
148 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幻灭
149 逆流而上：社会运动在美国
150 菲律宾社会运动面临民主挑战
151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152 新的权力与新的抗衡权力

风雨流民图 | 封面专题

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固然已成为当下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会过于忧心，因为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更有足够的方式来面对可能最坏的结果；我们当然也不会盲目乐观，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的当下显得相当严峻，须在短期应对之策和长远治本之道中寻求平衡

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

——珠三角农民工观察

文/谭翊飞【广州】

告别

对于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来说，保险中没有失业保险——他们被认为是有土地的一群人，不存在失业之说。而失业对他们的影响却是致命的。排队、退保、离开，这成了他们再现实不过的选择

2008年底，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在珠三角地区的劳动所门前，一群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做什么。他们不是做工伤鉴定，更不是聚众闹事，而是退回社保金。队伍秩序井然，像是一场告别仪式，因为他们退回了这笔社保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返回乡村。

就如西方人刚来到中国见到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裤子不可理解一样，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看：哪一国公民会这样减轻国家的负担，不要社保就回家呢？而这个国家的老一代人，则容易想到“农民的事情农民办，不给国家添负担”。

当然，以上仅仅是猜想。老百姓自觉不给国家添负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也还没有到来。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农民南下广东，堪称一段壮观的历史。王志纲在其《百万移民下珠江》一文中

这样描叙：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告别父老乡亲，被珠三角强大的引力吸入她宽厚的怀抱，在这个社会经济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曾使农民工南下“折了一下腰”，但“伤势”很快恢复，以后更便汹涌的南下，国家顺势推出了出口导向型的激励政策，并确立了廉价劳动力的国别比较优势理论。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第二轮的高速增长，年均超过两位数。据有关数据统计，迄今为止，广东省吸纳了三千万外来劳动力。

农民工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大包小包，肩挑背扛，拖家带口，从贵州、河南、湖北、江西等省份涌向广东——这个充满屈辱又充满希望的淘金地。

“屈辱”这个词没错，每一个早年出来的农民工都不会反对。深圳的张治儒，1993年来到广东，冬天的夜晚，他见到老板用水龙头对着工人冲，仅仅是惩罚上班迟到。他还见到保安打死了工友，几天之后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上班，他发誓再也不进工厂打工。回家创业失败，过几年他再出来，却不幸送货途中遇工伤。打官司索赔，“久病成医”，干脆成立了专门的打工组织——深圳外来工协会。这个组织现在已被取缔，改名后他有了一家新组织。

深圳的一家外贸企业老板回忆说，早年工厂保安打工人是家常便饭，关到一个小房子里，一群人打一个人，他有时都看得掉眼泪。在城市里，凭各种证件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边防证、未婚证、暂住证……

那时，从广州到东莞要4个小时的车程，中间有一大片荒地农田，厂子少，人却不断涌入。在工业区里，正如工人所说：三条腿的青蛙难找，两条腿的人

还不好找么？农民工带着辛酸和屈辱留在上世纪末期的南方城市，他们属于第一代打工者。

他们老了，80后慢慢成长起来了。1980年出生，到2000年已经有20岁了。珠三角的工厂依然一样，只招年轻人，年纪大的不要。那些没有技术的、35岁以上的农民工只能去到劳动条件更为艰苦的建筑工地和矿井，而工业厂房内仍然是新鲜的血液。80后成了打工的主力军。他们不满人格被侮辱，不满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他们不仅要生存，还要有尊严。孙志刚是个典型，他性格倔强，仅仅是因为在街上闲逛，没有带身份证，也没有办暂住证，后来被活活打死在收容站。

孙志刚死后第二年，长三角对珠三角的竞争态势已经显现，而作坊和工厂的迅猛增加、职业教育的落后、季节性用工需求剧增，竟然让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荒”。这种变化的背后不是劳动力数量的绝对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一个在东莞南城车站附近居住的江西某县的劳务中介说，那个时候，给好厂送人要给工厂人事部门送礼，这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而“好厂”仅仅指伙食里有肉，基本工资能比三五百高一些，最好是加班费能达到一千元。为此，工人选好厂，要交四五百元的介绍费，这相当于半个多月的工资。

也正是趁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东风，劳务派遣公司呈几何级数增长，他们专门“买人卖人”，囤积工人，提供给接到订单的厂家，只要一个电话，一个数字，人员马上送到。一个工期结束，人员送回，由劳务派遣公司负责发工资。深圳全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张全收凭借这一模式几年内成为资产达数千万的老板，而几年前他不过是一个枕着砖头、拣个破凉席睡在街头的流浪汉。

在民工荒的年代，工伤依然普遍。

那些依靠旧机器、没有职业培训却又超时加班的小厂成了吃手指的机器。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近十年来一直为工伤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估计，珠三角地区每年要吃掉四万只手指。这个数字是有据可查的，仅仅去一家家高楼林立的手外科医院的住院床铺就可以估算出来。工伤带动了手外科在珠三角地区的发达。工伤的秘密同样也可以在内地任何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县的任何一个村庄发现，你随意进入一个村庄，就会听说某某在外打工断手指的故事，那太平常了，只要手指能换来赔偿，他们并不觉得是伤害。

工人在付出生命代价创造财富与繁华，而他们讨要工伤赔偿却总是充满艰辛和绝望。有的人，甚至一家四人在同一厂里打工，四人中三人受工伤。2006年春节前夕，一位来自四川的16岁打工妹曾对我说，她新年最大的愿望是领到被拖欠的700元工资和他爸爸的工伤能获得赔偿。这对她来说，是个奢望。

许多老板根本不怕打官司，他多半是开出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赔偿价说：“你不同意？你去告啊，有本事你去告啊。”我不只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开庭的现场，老板的律师承认了一切关于工伤的事实，但就是不愿意付出应给的赔偿，他“站在农民工的角度”劝说农民工：这个官司我劝你不要打了，要打下去，起码一年，两年，耗死你。

一位在番禺打工的工伤者的老乡听了律师这样的劝说后，对他老乡说，“走，咱不告了，咱还怕他？老板有车有房有小孩，咱还怕他啥……”

工人普遍拥有社会保险，那是2005年左右的事，虽然2002年9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各类企业招用农民工，应签订劳动合同，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部门加强执法，并在处理劳动仲裁案件时更多倾向农民工，是2000年以后的事。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通知》，同年劳动保障部办公厅也致函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包括农民轮换工），应当适用《劳动法》”。而二十余年前，国务院曾颁布《关于严格限制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



劳工NGO在一家手外科医院的工伤病房介绍法律知识

知》的文件，十余年前曾颁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

为什么忽然有改变呢？在劳工学者看来，这是工人抗争的结果。没有工人血和泪的抗争，便不会有后来的进步。珠三角地区的劳工组织一直在默默地生长，最初他们还没有被香港及海外的基金会关注，只是维权者在上访、打官司中互相结识，互相鼓励。重庆律师周立太1996年第一次来深圳代理劳工案件后，竟意外留在了深圳，他发现这里的工人待遇太差了，他帮工人讨到工伤赔偿引起了轰动。他收留了许多工伤者，包括祝强，这个失去了右臂的农民工，后来，祝强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人组织。

十年左右的时间，工人草根组织已呈燎原之势，若从经济学分析则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事情。这些劳工NGO多半同时从事诉讼代理服务，他们一度被称为“黑律师”。正规律师收费高昂，而这些贴近农民工的“黑律师”收费低得多，市场空白让以法律服务为核心的劳工组织迅猛发展。因此无论怎么取缔，它仍然会顽强存在，只是挂上合法或非法的名义而已。

另一个原因则是珠三角的这种发展模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而这些企业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分享的利润却很少。作为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大多数企业所获得的制造环节的利润甚至还不到品牌商的1/10，整个产业链条，中国处于最低端，这样的发展模式，牺牲太巨大，得到却甚少。中国必须得改变，无论于内于外。

近年来，工人权益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新劳动合同法颁布被认为是标志性事件，被劳工学者认为是费了十年功夫才达成。珠三角的企业主却普遍不满，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拖垮中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劳动部门执法加强和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工人签约率大幅度上升，

而企业也难逃劳动局监管，必须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金。对于原户籍不在城镇的，保险的种类只包括工伤（无需个人缴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而对于原户籍为城镇的，则还包括失业保险。

不少工人本来对从工资中扣除了个人缴纳的保险费部分耿耿于怀，他们从未把自己当作新广东人看待，外界也没有为此创造足够的条件。而今，他们要返回家乡，下一步去哪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保险金既带不走，也移不到他的户籍所在地，他今后也不一定再来这个城市。一个退保的农民工说，“这个保险有什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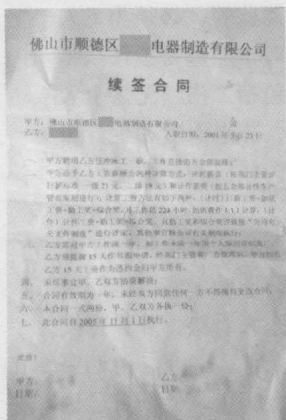
而对于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来说，保险中没有失业保险——他们被认为是拥有土地的一群人，不存在失业之说。而失业对他们影响，却是致命的。排队、退保、离开，这成了他们再现实不过的选择。

洗牌

企业主正在转嫁危机，趁金融危机之时，降低工人福利。一些工厂，即使订单充足，人员也充足，但却既降低工人的工资，又裁掉高工资时招收的员工，换进便宜的新员工

大旱、失业和贸易保护主义给2009年的中国添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谁也不能预料未来。然而，在失业的背景下，各地的招聘会却如火如荼。在郑州，多场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在春节前举办。甚至，河南某个农业大县的小县城也在筹划一场农民工的招聘会，当地劳动部门已经准备将“新增就业岗位人数”进行上报。在珠三角地区，政府命名为“春暖行动”的计划更是要组织万场招聘会。

政府为农民工失业焦心诚然可嘉，



一份工人的劳动合同

但招聘会本身并不能增加就业岗位，除了增加会务人员外。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热闹的招聘会？为什么各地仍然可以上报许多“新增就业岗位”呢？莫非经济危机是一场假象——经济根本没有出现大衰退，企业依然在不断招聘新员工，农民工大多数依然可以找到工作？

当然不是这样。热闹的招聘会令人喜，更令人忧，其中奥秘却只有工人自身和企业主知晓，地方政府多半只记住招聘了多少人，这个数字可以成为政绩，而至于劳动力市场的总体供需状况，则似乎与他们无关。

近年农民工待遇的改善让许多企业主不满，女首富张茵、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都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新劳动合同法，新劳动合同法成了企业主发泄对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不满的靶子。经济危机更使这种不满集中爆发。

因为危机的到来，企业主和政府劳动部门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深圳一位企业主说，危机之后他们再也不怕劳动部门的人了，因为他们再也不会随便就开个罚单。企业自身难保，如果你开罚单，企业主就干脆走人——对企业主来说，土地是租来的，设备多是陈旧的，并不值钱，固定资产成本很低，想走，很容易。这是当初片面招商引资的恶果，一切为资本服务，而在危机时刻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钳制住资本，资本的流动似乎是来无影，去无踪，老板也可以随时失踪。失踪后，可以在更偏远的地区，以同样的模式，再办一家新的工厂，只要资本属于他。

企业主反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理由很简单，近年来的劳动执法加强和新法颁布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气。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用工超过一个月没签合同，企业须支付双倍工资。这是一条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是指对受害方的实际损失予以补偿性赔偿之外的赔偿，通常是因为侵权方的一些特殊的不当行为所致。在珠三角地区，许多企业招工不签劳动合同，一旦工人发生工伤等事故，连证据都找不到，这一条惩罚性的赔偿措施让更多企业主选择与农民工签合同。对于依靠非合同工的企业来说，其随意赶工人出门的难度大了许多。合同一签则意味着劳动局有案可查，接下来，企业就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金。

其二，社会保险费。若以一家5000人的企业计，员工平均月薪为1500元，企业要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比例约为8%，而企业需缴纳13%，由此计算，企业立即增加的负债会达到： $1500 \times 5000 \times 13\% = 975,000$ 元。而且，因为员工必须自己缴纳一部分，这实际上降低了员工自己的显性工资收入，被工人认为降低了工资。

其三，十年以上工龄，若要辞退工人，需补偿每年一个

月的工资。以上述企业为例，假设有1500人工龄十年，最后三个月月平均工资为1500元，那么这家企业的隐性负债一下增加了： $1500 \times 1500 \times 10 = 22,500,000$ 元。这个数字对于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当可观。

珠三角的一位企业主说，三项组合，仅仅劳动力成本增加已是一剂猛药，更别谈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他们辩护说，工人并非没有享受到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成果。若以2000年的工人平均工资（包括加班费）和2006年的平均工资（也包括加班费）计算，2000年工人平均为460元，而2006年普遍达到1000元，相当于每年环比增长了15%，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也与GDP同步。

那么到底谁让农民工至今在城市里住不下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呢？企业主把责任推给政府——政府的税收没有用于改善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却指望企业在一次分配中承担过多的责任。

反弹是必然的。上文所述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在金融危机后对中山、东莞、佛山和广州的四座城市的134名农民工做了一项调研，结论让人吃惊。这4个城市的企业有19.4%减薪，13.4%增加了扣款，如伙食、水电、罚款，25.4%不买社保了，35.8%处于半放假状态，21.6%裁掉一些老员工，保留一些工人上班，4.5%更改劳动合同让员工变成另外一家厂的员工，但仍然在原址上班，3%先解除劳动合同，不签合同但仍然在原址上班。这些数据表明，企业主正在转嫁危机，趁金融危机之时，降低工人福利。

一些工厂，即使订单充足，人员也充足，但却降低工人的工资，又裁掉高工资时招收的员工，换进便宜的新员工。

招聘会表面火爆的实质也正在此，企业并非缺少工人，市场也并非增加了

劳动力需求，而是企业需要换掉工人，从而节省劳动力成本。这相当于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大洗牌，这种洗牌不由工人主导，而是由政府和尚未倒闭的企业主共同策划。洗牌加速将导致竞争能力弱的工人越来越难找到工作，而工人的整体福利水平则大幅度降低。

面对如此情形，中央政府面临两难：一方面要保企业，期望通过投资拉动和减税政策让经济快速复苏。这对于提升国内和全球的经济信心，走出危机阴影很有必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内需不足，而要扩大内需必须改善民生，中央政府除了更大力度关注旱灾，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和试图急速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外，似乎也难觅他法。

但是，为了保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早已偏向于企业主，农民工离开，只要不引起群体性事件，他们完全可以不闻不问，除了招聘会也几乎看不到沿海地区对外来农民工的实质帮扶措施。相反，农民工离开却让一些部门有利可图——农民工退保后，企业部分不退，等于充实了广东省的社保资金。而企业倒闭后拍卖中的“围标”行为则增加了政府官员腐败的几率。

目前，中央财政资金尚称丰腴，地方财政资金状况却极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尚未探底，如果继续走冷，也将让依靠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政府还面临约束自身的难题。

体制的惯性或许早已决定了一切，但如果继续过度依赖投资拉动，那么经济结构可能进一步畸形化，下一轮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来临将无药可救。过早复苏，或许并不一定是个好消息。

行动

那些对农民工失业的后果想象过度的人大概要失望了。春节前农民工大返

乡，整个场面却显得很和谐，除了一些厂子倒闭后被拖欠工资引发了群体上访外，并没有引发太多流氓骚乱之类的事件

2009年2月7日，北京五道口，民间组织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举办新年后的第一场论坛，平时一个教室坐不满，而这次却异常拥挤，临时启用一间教室进行视频同步直播。演讲的主角是许志永博士，他最近进行了一系列维权活动，如现场举报“黑监狱”、代理三鹿受害家长案件等等。他演讲的主题是：非暴力公民维权。

有人在他的演讲中提问：今年这么多农民工失业，又有那么多纪念日，依你来看，会不会出什么事？许博士巧妙地回避了问题，说谁也难以预料什么事一定发生，什么事不发生。

那些对农民工失业的后果想象过度的人大概要失望了。春节前农民工大返乡，整个场面却显得很和谐，除了一些厂子倒闭后被拖欠工资引发了群体上访外，并没有引发太多流氓骚乱之类的事件。这或许超出了一些人的预期，可称之为第三个奇特的现象。

为什么没有？

首先，放假而非裁员是许多企业主的策略性举措。农民工因为难以承受城市生活的基本开支必须返乡。这个过程，没有人逼迫，而是自愿。对企业来说，减少了因裁员而产生的违约支付，对农民工来说，既然是自愿离开，赔偿便无从谈起。但可能把问题都留给了2009年春夏季。

其次，中国粮食连续五年增产，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相比前几年一路上涨，虽然最近出现大幅下跌，但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农民的日子要好过多了。据官方统计，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实际增长8%，2007年为9.5%，从2004年以来，连续五年超过6%，农村近年相对稳定为农民工返乡提供了基本的稳定支撑。

如果从农民工内部结构和群体心理分析，或许能找到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经典之作——《上海罢工》一书的作者裴宜理女士，提出了她对上世纪上海工人运动研究的独特观点，她认为：“当学者们发现工人对于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天生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相去甚远时，他们不免又冷嘲热讽。”她认为：对农民来说，亲缘和地缘关系比阶级关系更重要，这一观点也适合于中国的工人运动。

如今，我们重温这一说法，却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农民